

# 日本“印太”战略的生成机理及其战略效能探析

宋德星 黄 钊

**【摘要】**21世纪前期，“印太”作为不断成长的地缘战略区域，在深刻影响着全球地缘政治大图景的同时，也使一向对地缘政治十分敏感的日本将事关国家昌盛的权势博弈舞台渐进地投向了涵盖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广阔区域，推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日本“印太”战略理念的生成，既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历史教训，又有强大的战略动能和战略牵引，表明其试图在更加广阔的地缘范围内主动提升权势与拓展影响，这蕴含着日本在21世纪谋求实现“国家自立”的战略意图，故其不仅对于日本国家战略目标具有赋值功能，而且对于日本权势扩张发挥了力量倍增效应，对于日本核心战略关切发挥着引领作用，因而具有强劲的内在张力。在构思和推行“印太”战略的过程中，安倍政府始终秉持国际权势斗争的固有逻辑，具有鲜明的中国指向性，一度致使中日关系中隐藏的战略风险明显上升。为维护中日关系总体稳定和渐趋向好势头，我们应当透过历史和地缘双重维度，研习日本“印太”战略思想的演化轨迹，理解其战略逻辑构思，审视其战略缔造动能与政策进展，明辨其对华实有和潜在影响，据此思考中国的应对之策。

**【关键词】**日本外交；“印太”战略；海洋国家；战略效能；中日关系

**【作者简介】**宋德星，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黄钊，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京 210039）。

**【原文出处】**《世界经济与政治》（京），2019.11.34～54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上丝绸之路地缘安全及其风险管控研究”（项目编号：18ZDA13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在特定历史时期，国际权势较量牵动着的大国兴衰无疑具有恢宏的地缘政治意义。正是权势政治的内在逻辑使得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地缘战略成为国家意志的载体，进而一定程度上使得地缘战略博弈成为国家意志的较量。审视东亚地缘棋局上的日本，先后经历了近代急速崛起与穷兵黩武招致的权势兴衰更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基于战略隐忍和奉行“贸易立国”路线成功赢得了世界经济大国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腾飞顺势开启了寻求“政治大国”理想进程。时至21世纪前20年，“印太”作为不断成长的地缘战略区域在深刻影响着全球地缘政治大图景的同时，也使得一向对地缘政治十分敏感的日本将事关国家昌盛的权势博弈舞台渐进地投向了涵盖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广阔区域，推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近似的时空维度下，

中国正致力于推进建设海洋强国和“一带一路”倡议，而美国、印度等大国也竞相出台了经略“印太”的长远方案，突显了“印太”这一地缘战略区域对于大国的极端重要性。在“印太”国家间权势较量日趋激烈复杂的情景下，探寻日本“印太”理念生成的历史逻辑和政策逻辑，安倍政府“印太”战略延展定型的政策轨迹，进而明晰其“印太”战略实施的内在动能和主要战略意涵，特别是剖析其在日本国家战略体系中的地位 and 其中的涉华因素，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一、日本“印太”理念生成的历史逻辑

历史地看，当日本由内向外审视自身安全环境并展望民族前程时，其视线所及之处总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浸透着权势考量（从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度包括了帝国野心），并直接映射在相

关地缘观念之中,如“大东亚”“亚太”“印太”等观念。故从长历史时段出发,挖掘日本“印太”理念生成的历史逻辑,有助于明辨日本权势扩张思想的嬗变及其随之而来的政策轨迹与延伸步骤。实际上,日本“印太”理念的生成深深根植于其近代以来急切参与大国权势博弈的历史进程之中:它始于近现代历史时期日本对于“印太”区域的展望、觊觎、建构乃至侵略的尝试;战争落败后,它酝酿于战后初期日本国家路线选择进程中的政策内向化和对地缘战略视野的重构;伴随冷战步入尾声,它萌生于日本国内发展取得巨大成就而自然催生的政治大国愿景与对外政策调整的互动之中。

### (一)近现代日本强国追求进程中的“泛印太”扩张逻辑

虽然正式意义上得到西方学界和政界广泛认可的“印太”地缘概念是21世纪以来由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的学界和政界人士率先提出并有意识地予以推广,但是回顾日本德川幕府后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近现代历史,其间日本也曾有过一种“泛印太”战略思维,表现为对印度洋—太平洋区域的展望、觊觎、建构以至侵略举动的尝试。相对于日本大多数时期将对外战略视角锚定于东亚的历史事实,其近现代历史上基于“泛印太”思维而衍生出的种种政策行为足以见证日本始于自强、经于自负、终于自毁的扩张逻辑及其深刻教训。

日本早期的“泛印太”思维与战略关切得益于明治维新之前的思想启蒙,主要从海洋和陆地两个维度展开。实际上,在德川幕府后期,日本兰学和经世学家本多利明(Honda Toshiaki)怀揣重商主义信条提出“开业”思想,主张日本应立足于“海国”身份发展海上贸易,开发周边领土并摒弃锁国体制。本多在所著的《经世秘策》(1798年)中阐释:“将船舶遣往万国,采取国用、要用之产物和金银铜输入本国使国力日渐雄厚,是身为海国伴生不离的必然政策。”<sup>①</sup>秉持这种海上通商与贸易立国的思想,本多不再将战略注意力停留于日本的直接邻国朝鲜和中国,还将亚洲全境纳入其战略视野之中。通过描绘经济自立自强愿景,本多播种了日本明治初期以进军海洋为途

径的“南进”思想的萌芽,可以说这就是近代日本“泛印太”思维的源起。在陆地维度上,幕末时期的思想家佐藤信渊(Sato Nobuhiro)又为后来的军国主义日本提供了“从占领满洲到进发东南亚”的政策动机。信奉民族优劣论的佐藤在《宇内混同秘策》(1823年)中认定,日本是“处于世界中心的国家”,主张“夺取”中国东北将其作为增进国力的重要地区,以图向东南亚进发之机。<sup>②</sup>其进一步“南进”的计划还包括“攻取吕宋、巴刺卧亚,以此二地为图南之基,进而出船,经营爪哇、渤泥以南诸岛,于其要害之地置兵卒,更张国威”。<sup>③</sup>可见,即便是基于陆权扩张思想,“更张国威”逻辑决定了日本不会仅把目光投射到东南亚,而且包括了与东南亚紧密相连的印度洋地区。这种陆权扩张逻辑同样强化了此际日本的“泛印太”意识。

上述幕末时期日本对亚太外层地域的透视尽管不够清晰,至多只是一种“泛化”思维,但却具有深远的影响,体现出其意欲谋求崛起和权势扩张的野心。这种“泛印太”性质的思维一方面唤起了日本整个国家向亚洲大陆及更远地区进发的内部动能,另一方面也助长了国家利己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泛滥的思潮。其典型表现就是明治维新的理论奠基者和精神领袖吉田松阴(Yoshida Shoin)推出的“海外雄飞论”。“雄飞”与“雌伏”相对,意为如雄鸟般振翅高飞,展现的是一种蓬勃跃升的势头。<sup>④</sup>吉田在《幽囚录》(1854年)中描绘了他眼中的世界情势与国家立足之道,表达了对国家能够把握这种进发势头的企盼:“国之兴衰犹如日之升降、月之圆缺,而国之存立不仅在于守成不失,更在于增益所获。当前国之紧要精修武备,如若舰船与枪炮计略制立完备,必能开拓蝦夷,伺机夺取堪察加和鄂霍次克,收取琉球,纳取朝鲜,割取中国东北部的土地,南至渐进获取台湾、菲律宾群岛之势必将呈现。”<sup>⑤</sup>的确,明治维新成功的日本如吉田所愿成为亚洲近代历史上唯一保持主权独立的国家,且乘着这股“雄飞”之势,进入接连不断的侵略扩张之中。

在日本其后的侵略扩张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其民族一种独特精神结构塑造下的战略思维模式,即对环境的敏感、强烈的共同体意识、交替出现的自

卑与自负状态,三者造就了日本始终追求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民族抱负,同时意欲霸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邻国。<sup>⑥</sup>通过日俄战争初步实现这一抱负的日本又将“自负”状态作为一种当然逻辑来指导国家的对外政策。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权势野心不断膨胀的日本遥望“南洋”,逐步形成了帝国野心驱使下的“南进”战略。随着1941年年底偷袭珍珠港一役重创美军太平洋舰队,日本开始专注于面向印度洋的规模宏大的“南方作战”计划。<sup>⑦</sup>其既定范围涵盖整个东南亚到太平洋的西侧部分,南北跨度约2400千米,东西跨度约5400千米,关键目标是控制印度洋与南海之间的战略要冲新加坡。

与偷袭珍珠港并行,日本从陆海两个方向发动了针对整个“南方”的全面进攻,决心挑战英国在印度洋上的霸权。历史学家塞缪尔·莫里森(Samuel Eliot Morison)称,日本帝国海军为构筑其控制下南中国海的西部防御,受命对驻扎在锡兰的英国东部舰队(the British Eastern Fleet)实施了一次珍珠港式的打击。在战场上,日军很快占领了安达曼—尼科巴群岛,构筑起帝国“南部资源产地”的西部屏障,以防盟国从印度洋向该地发动袭击。<sup>⑧</sup>在重创美、英、荷、澳远东海军主力后的一段时期,“从印度洋到太平洋,能够在这片浩瀚洋面上自由航行的只有日本海军,日本自认成就了‘海上霸主’”。<sup>⑨</sup>尽管日军在印度洋上的行动带有攻势防御性质,且无法长久维持,但其将权势投射到印度洋和南亚地区的野心却暴露无遗,也充分印证了此际日本“泛印太”战略思维的冒险性与危害性。<sup>⑩</sup>日本所谓“南进”取得“成功”的标志是1943年11月在东京举行的“大东亚会议”,其间日本扶植的“自由印度”伪政府领导人钱德拉·鲍斯(Subhash Chandra Bose)表示,将积极响应日军计划在印度东北部的英帕尔实施作战。<sup>⑪</sup>然而,战场上的“成功”恰恰成了日本国家走向衰败的拐点。日本将野心延伸至“泛印太”并据此实施扩张侵占,显示其国家战略陷入穷兵黩武的路径依赖。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与日本国家主权的丧失,不仅破灭了日本的“泛印太”战略思维逻辑,而且这一深刻的历史巨变在相当程度上重塑了此后日本的

“印太”观念。

(二)战后日本经济腾飞时期事涉“印太”的地缘经济思辨

审视战后日本的国家大战略缔造,一个得到广泛认同的观点是:“日本的成功在于,依靠美国的安保效应能将绝大部分的国家预算用于非军事需要。”<sup>⑫</sup>这一时期,日本得以出现经济繁茂景象,很大程度上算是对国家曾经陷入穷兵黩武之中进而背离目标设定与体量现实的一种战略反思。当然,从国家发展的逻辑上看,即便是在“吉田路线”得到切实执行的时期,日本的大国意志也未曾轻易泯灭,只是其大国定位已由早期的军事大国追求转变成经济大国追求。实际上,战后日本政治家们认识到,要想重返国际舞台,让渡出大部分的权势(主要是军事力量)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日本达成振兴国内经济目标的必要代价。在吉田茂(Yoshida Shigeru)之类战后日本政治势力中的“保守本流”看来,暂时放弃部分权势,对于日本国家大战略的缔造可能也仅仅是个权宜之计。<sup>⑬</sup>一句话,吉田茂只是把内心深藏的强国抱负投向了经济领域和未来。

鉴于自身被一个巨型体量国家美国完全掌控,战后初期的日本不得不将国家大战略的投射范围收回本土。此际,被占领后重回起点的日本需要思考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方面,通过军事路线追求国家战略目标的尝试不再可行,那么必须另外选择替代方案;另一方面,之前在步入军国主义道路背景下,崇尚扩张的地缘战略信条在战争中连同“陆主海从”与“海主陆从”方针间的冲突一并覆灭,结果是日本需要重新思考释放国家战略的空间维度。关于前者,放弃交战权的日本在美国的指导下制定了“和平宪法”,从而摆脱军国主义的束缚去“拥抱”半主权国家地位,日本自此迎来了以“经济中心”“倒向美国”和“轻军备”为核心原则的“吉田路线”。<sup>⑭</sup>至于后者,伴随着经济与科技文化事业的复苏,日本国内在对战前地缘思想做出一定程度批判的同时,在思想观念领域逐渐将视角转向了新的“海洋国家论”。

基于岛国地缘属性,围绕上述问题的政策思考于20世纪60年代拉开了日本地缘政治研究复兴的

序幕。其间,京都大学著名国际政治学者高坂正尧(Kosaka Masataka)率先提出依靠海洋实现日本繁荣富足的构想,首倡将日本打造成“海洋国家”,引领了将地缘视角与国家路线相结合的一股新思潮。高坂从文明史的角度试图重新找寻日本在国际格局中的定位,并在著作《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中认为:“日本从未被大陆势力的武力所征服,同时又能在自我文明的孕育过程中从外界获得必要的滋养。日本既不归于欧美文明,亦非从属东亚文明,如若将欧亚大陆上的文明比作主室,日本的身份就应是那个‘东侧的旁厅’。”<sup>⑤</sup>在施政建言方面,高坂主张“依靠海洋的地理特性与美国海上霸权的保护来维持最小限度的防卫力量,并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制衡邻邦”。<sup>⑥</sup>这样,高坂成为“吉田路线”的坚定支持者,其“旁厅”概念也就成了战后日本“贸易立国”路线的思想源头,而“通商型海洋国家”更是成了此际日本国家路线的地缘观体现。应当指出,受制于时代氛围,此际日本地缘视野的构建经历了一个较长过程,浸透着“吉田路线”的务实隐忍,滋养于池田内阁“经济立国”催生的“国民收入倍增”愿景,演变至佐藤内阁基于经济实力的影响外溢和追求国际制度的完善,在政策层面一定程度上否定了现实主义关于“大国必须是军事强国这一不言自明的道理”。<sup>⑦</sup>

基于“吉田路线”,遵循着高坂理念成为“通商国民”,经济起飞时代的日本重新将视野投向了东南亚国家,通过实施商品贸易和资本输出,在彼此间形成了稳定的经贸依存体系。而“通商型海洋国家”实践中甚为重要的资源通道与贸易航线因素,又将日本牢牢嵌入与中东地区及印度洋北侧海域的互动之中。1973年爆发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令严重依赖阿拉伯国家原油进口的日本经受了外交、经济与国内社会层面的巨大压力,也使日本意识到今后不仅要调整中东政策,更要通过全方位的国际外交拓展战略视野。至此,日本逐渐将国家对外政策的视角再次触及印度洋。时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大平正芳(Ohira Masayoshi)内阁提出了“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的对外政策,致力于构筑环太平洋地区的国际秩序与合作关系,显现出当日本以一个经济大国的形象出

现时,国家视野与国民心态即将迎来新一轮转变。从战后地缘战略视角的重构上切入,日本将自身重新定位于一个剥离了海权思想中力量要素的“通商型海洋国家”,由此关注资源通道和贸易航线。其战略眼光自然也会投向太平洋及其以外的印度洋,将中东地区及印度洋北部视为本国的利益攸关地带,形成一种典型的“印太”地缘经济思辨。

(三)冷战结束前后日本外交认知中“印太”理念的萌生

伴随20世纪60至80年代在经济领域的强劲发展之势,整体意义上的日本国民心态开始显露出更多自信的成分。在经历70年代石油危机等事件引起的一系列政策争论之后,笼罩在战后初期那种战败引发的自卑心态渐次消散,转而变成一种要求得到广泛国际认可的“大国意识”,并随着80年代中曾根康弘(Nakasone Yasuhiro)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口号和“政治大国”理想而变得日趋强烈。<sup>⑧</sup>这种整体国民心态的转变对于国家的对外政策催生出两方面的变化需求:一是用以达成战略目标之手段的变化,它要求日本改变先前以经济、科技这类低级政治事务带动国家在高级政治领域影响力及威望等级提升的惯用做法;二是地缘视野的变化,它要求从顶层规划上思考并明确关乎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地域范围,以回应日本对国际形势的关切。

审视此刻日本的手段运用与战略视野的变化,离不开日本的地缘理念构建过程。事实上,在充分践行“吉田路线”期间,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国内还涌动着一股更为“外向型”的海权思潮,它与“通商型海洋国家”的主流理念伴生,并在国内发挥影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自民党海空技术调查会于1972年推出的研究报告《海洋国家日本的防卫》,其主旨重在阐释“美国以军事力量为核心要素的制海权充分保障了日本战后依存于海洋的国家政策”,但关键是该报告同时指出了“美国制海权运用中的局限所在”,并要求日本从长远意义上筹划军备、发展海上力量,改变片面依赖美国保护的状况。<sup>⑨</sup>该理念对于日本地缘战略的定位恰与战前日本海权理论奠基人、受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

海权思想深刻影响的海军中将佐藤铁太郎(Sato Tetsutaro)在《帝国国防史论》和《国防私论》中的思想契合,<sup>③</sup>可认为是在佐藤海权思想的延长线上。

这种发展外向型海权的声音在日本国民心态愈加自信的氛围中得以脱颖而出,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推动日本对外政策转变的一股强劲力量。进入冷战后期以来,美苏两大集团间的力量对比逐渐呈现向美方阵营倾斜的态势,日本看到了在同盟内部寻求发挥更多作用的机会,于是在保障关乎日本安全和利益的海上航线问题上要求做出更大的“贡献”。<sup>④</sup>在具体实践中,时任首相铃木善幸(Suzuki Zenko)在1981年5月访美期间首次提出日本周边海域1000海里航线的防御问题,成为战后以来日本明确在亚太区域划定安全和利益核心关切范围的标志性事件。在发表的日美联合声明中,双方表明将在确保日本的防卫与远东地区的和平安定方面适当分担职责,其中日本将努力改善本国海空周边领域的防卫能力。<sup>⑤</sup>由此,日本开始郑重围绕海上航线的防卫问题制定具体方案:在1982年7月决定大幅增加自卫队P-3C巡逻机和F-15战斗机的装备规模;在中曾根康弘担任首相后的1983年,主推围绕1000海里海上航线的日美联合作战计划。该作战计划经过不断发展,演变成为冷战结束后日美为应对中东地区发生战事而共同守卫海上航线的“5053作战计划”。<sup>⑥</sup>立足于重建“海权”的新思维,日本开始将对外政策的投射范围逐渐向外拓展做实,在当时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开始强调更多发挥自主防卫。

中曾根内阁所做的努力正好反映出日本开启“政治大国意识”之后,想要解决对外政策中手段单一与地缘战略目标模糊的时代问题。应当指出,海上航线防卫计划中的1000海里并不是日本地缘战略视野的边界,而只是当时日本防卫力量手段运用的极限。在达成战略目标的过程中,日本亦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发挥国际影响。在冷战末期,日本与澳大利亚共同发起成立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与区域内国家的经贸联系日益紧密,并在成员国之间发挥缓解分歧、促进协商的桥梁作用。然而,1990年海湾战争的发生成为日本在国际秩序新旧更替时

期调整对外政策时经受的首次重大考验。战争中,日本拒绝了美国派遣自卫队和参与联军的要求,而是通过承担130亿美元的战争费用以及战后在海湾地区实施扫除水雷行动来表现本国的参与,但日本的举动换来的却是被国际社会称为“支票外交”的指责。

亚太以外区域存在感的缺失和国家颜面的丢失成为日本强化区域影响和国际作用的巨大动力,<sup>⑦</sup>也推动了冷战结束至今愈演愈烈的“普通国家”化思潮。纵观冷战后期日本开启的“政治大国”理想与实践,正是在对外政策的转变中萌生了“印太”理念的宏观认知。此际,尽管没有关于“印太”的明确命名或称谓,但日本通过对地缘战略视野的重启、对力量运用范围的重构、对国家间互动手段的选择,一步步建构起亚太之外区域与自身安全、利益、影响和威望之间的紧要联系。可以说,正是“政治大国”理念决定了日本外交政策中的“印太”认知逻辑。

## 二、安倍政府“印太”战略延展定型的政策轨迹

进入21世纪,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使日本看到了施展“政治大国”抱负的崭新机遇。以安倍晋三(Abe Shinzo)为代表的日本政界精英逐步确立了不懈追求国家权势,并在国际上发挥自身影响力的基本战略思路。经过践行“普通国家”这一全新的国家路线,第一任安倍内阁时期的日本政府开始实施对外政策的调整转型,着重发掘欧亚大陆外缘到印度洋周边地区的战略价值。借助国际地缘战略博弈聚焦于“印太”地区的势能,2012年再度实现执政的安倍政府展开了海洋方向上的一系列战略运筹,试图构建一个“印太”范围内主要海洋国家联结而成的“菱形”战略架构,抢占地缘战略高点。随着“印太”理念触发的大国间关系重组与地缘竞争愈演愈烈,执政基础愈加稳固的安倍政府适时启动了对外战略的主动塑造过程,延展并升级了酝酿多年的“菱形”地缘战略架构,强势推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使之成为日本当前对外战略的核心取向。

### (一)雏形初现的“自由与繁荣之弧”构想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格局演进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主要大国根据国际权势分布的新现状来调整对

外政策目标与手段,进而重塑对地缘政治的理解。<sup>⑤</sup>沿着这一思路,从地缘政治的宏观视角出发即可发现,冷战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政治呈现的一个崭新面貌是:从印度洋到太平洋的广阔地带,已成长为足以呼应地缘政治全球视角的巨型战略区域,它强烈吸引着各主要大国和力量中心的注意力,深刻塑造着当今和未来的国际战略大图景。

在地缘政治深刻变动的大背景下,旧格局的渐次坍塌让日本在21世纪初看到了施展“政治大国”抱负的新机遇。早前国家成就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的日本,此刻急切地启动了国家战略转型的进程。在这样的趋势下,小泽一郎(Ozawa Ichiro)、小泉纯一郎(Koizumi Junichiro)和安倍晋三等日本政界精英们充分拓展和升华了中曾根康弘的“政治大国”理念,将其化身为“普通国家”这一更加易于推广的一般性政治概念,使之成为自冷战结束延续到21世纪初期日本发挥自身影响力的基本战略思路。通过这一全新的国家形象设计,第一任安倍内阁时期的日本政府自2006年年底开始实施对外战略转型,核心是着重关注欧亚大陆外缘到印度洋周边地区的战略价值,以尊重所谓自由、民主、基本人权、法治与市场经济为标签,积极倡导同为地区性大国的日本和印度与全球性大国的美国连同“中等强国”澳大利亚开展紧密的战略合作,进而为日本实现国家战略转型营造一个总体有利的国际环境。<sup>⑥</sup>

在安倍的“普通国家”战略构想中,除了重视传统盟国美国和澳大利亚外,还认为“历史上对日本存有亲近感、与日本具有相同价值观又具备极大发展潜力的印度,本应与日本建立更高层级的战略互动与外交经贸联系”。<sup>⑦</sup>为推动日美澳印四方合力,安倍提出“日本有必要在四国合作机制中发挥主导作用”。<sup>⑧</sup>为将自己的战略思考和施政理念付诸实践,安倍在出任首相后的首次国会演讲中即提出要加强日美同盟关系,同时与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共享价值观国家”开展政府间最高级别的战略对话。<sup>⑨</sup>此后不久,时任日本外相麻生太郎(Aso Taro)正式提出建立“自由与繁荣之弧”的外交构想。在外务省2007年发布的《外交蓝皮书》中,日本政府对该构想进一步阐释,

强调要在从波罗的海、东欧、高加索、中东、中亚、南亚直至东南亚等地区重点推进“民主化进程”,致力于同美国、印度、澳大利亚及欧盟等“共享利益”的国家与地区建立更加牢固的关系,进而确保“自由与繁荣之弧”的形成与扩大。<sup>⑩</sup>至此,从政府顶层规划与太平洋到印度洋区域国家间的战略合作便成为日本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自由与繁荣之弧”构想也就自然成为安倍在首个任期内回应国际形势变动与国家战略转型的现实举措,更为后来的“印太”战略勾勒出政策层面的雏形。

随着外交与安全领域具体行动的展开,安倍在2007年8月到访印度国会时积极兜售这一理念,双方在2008年10月发表《日印安全合作联合宣言》,决定加快战略层级的互动。与此同时,日澳之间的战略合作也在提速,双方在2007年发表了《日澳安全合作联合宣言》,建立防务部和外交部部长级“2+2”对话等机制。但上述一系列整合“印太”区域友好国家间战略互动的政策思路,在安倍因身体原因辞去首相职务后而变得模糊,并在自民党下野后渐归于沉寂。然而从后来的事实中可以看出,蛰伏期间的安倍并未停止对“印太”战略理念的继续思索,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正促动其展开下一步政策调适与筹划。

## (二)日渐演化的“亚洲民主安全菱形”构想

就地缘政治张力而言,大国间在某一区域内展开的战略博弈不仅表现为对外政策的折冲,更蕴含着国家意志的较量。<sup>⑪</sup>那么国际权势结构在21世纪首个十年后呈现的新变化、新趋势无疑激化着这层较量。其间,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以可持续发展为根本目的的快速和平发展却招致美日等国的战略警觉乃至战略打压,如美国奥巴马政府强势推行亚太再平衡政策,全方位加大对太平洋西侧的战略投入,发起面向中国的战略较量。在这种国际战略态势的驱动下,日本的“印太”地缘理念随即加紧演化,发展成系统性的国家对外战略。

2012年年底再度组阁实现执政的安倍一方面致力于为“普通国家”化路线奠定坚实的国内基础,另一方面提出“积极和平主义”对外政策主张,潜藏意图是以强化日美同盟关系为主轴,形成抑制“中国威

胁”的战略态势。在此基础上,日本规划在海洋方向开展一系列战略运筹,通过构建一个海洋国家联合阵线化解来自东亚大陆的战略压力,同时意在把握未来世界地缘政治深刻变化所带来的战略机遇。从决策者个人层次看,秉持“做战斗型政治家”信条的安倍,<sup>②</sup>通过先前从政受挫的经历磨炼出骨子里的强硬与韧劲,并直接反映在外交领域。对于其主导的“俯瞰地球仪外交”,安倍认为其内涵在于“不仅关注与周边国家的双边交往,而且要像注视地球仪那样俯瞰整个世界,立足于自由、民主主义、基本人权、法治等价值观,开展战略性外交”。<sup>③</sup>

本着“战略性外交”理念,基于对国际格局的研判,第二次执政后的安倍政府重拾下野之前的地缘战略构想,开始在官方场合更多提及“两洋”与“印太”概念。2012年年底,安倍在《印度报业辛迪加》网站撰文阐述“亚洲的民主安全菱形”构想,强调“印度洋与太平洋的和平、安定及航行自由密不可分。日本要在维护以上两个区域的共同利益方面发挥更大作用”,<sup>④</sup>突显“两洋交汇”的重要意义与日本承担的重要角色。由此,安倍提议“由日本、美国、印度、澳大利亚四方组成‘民主安全菱形’框架,保障从印度洋到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sup>⑤</sup>显然,“菱形”构想的推出是“自由与繁荣之弧”理念的接续,但其反映的战略内涵却有进一步演化与精炼。为了尽快发挥新构想的政策效应,日本展开了一系列推广与宣介。2013年2月,安倍前往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题为《日本归来》的演讲,<sup>⑥</sup>阐明日本在“印太”的主要任务是做“规则的倡导者和全球共同利益的捍卫者”。这是日本官方首次使用“印太”这一术语,也显示出日本欲借助美国的战略势能规划下一步外交新举措。2015年,日本外相岸田文雄(Kishida Fumio)在与印美高层会面的外交场合开始赋予“印太”概念实际安全议题。同年年底,安倍在访印期间与印方共同发表《日印展望2025: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宣言,表明日方将定期参与美印“马拉巴尔”联合军演,期待日印在安全防务领域开展更多交流合作。<sup>⑦</sup>

上述一系列举动表明,安倍第二次执政后打造的“民主安全菱形”构想正演化为日本对外战略规划

中的伙伴联动,以便为其构建出一个明确的安全合作机制与地缘战略构形。其核心是:为日本提出的四方合作倡议赋予高度形象化、专属化的概念内涵,对其中的“印太”地缘术语进行具有目标指向性的散播与升级,以印度这个不断上升的力量中心为切入点,迎合其提升国际威望和参与国际事务的战略需求,将其拉入日本战略轨道。在安全领域,日本名义上仍然将“印太”置于“亚太”概念的身后位置,不急于让己方构思中的地缘战略架构直接面对激烈的大国博弈。例如,日本在2013年年底推出的《国家安保战略》和《防卫计划大纲》中并未明确使用“印太”表述,折射出安倍政府意在等待国际形势演化的适当时机,筹备变革来临时的应对。

### (三) 延展成型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

作为国际权势动态转移的发生地和目标场合,当下的“印太”地区无疑触发了大国间新一轮的关系重组与地缘竞逐。其间的战略博弈态势正显现出一个鲜明的特征:由陆向海、依海强国已然成为各大国实力、谋略及意志对决的基本战略取向。<sup>⑧</sup>在“印太”地区总体战略形势的催生下,日本安倍政府在执政愈加稳固的基础上,适时启动了对外战略的主动塑造进程。在强化日美同盟关系的基础上促进日美印澳四方战略联动,在防范目标总体指向中国的总基调内尝试调整过于僵化的对华关系,在安全互动与经贸往来愈加频繁的地区布局中拓展与东盟国家的务实合作。这种对外政策的能动性必然会深化日本跨越洲际的外交实践。在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现实面前,一种亚太乃至“印太”秩序可能由中国主导的紧迫感又催生日本地缘战略思维的持续发酵,导致“民主安全菱形”构想进一步延展与升级。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016年8月,安倍在出席肯尼亚举办的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时,首次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标志着日本一项新的复合型对外战略的正式出台。安倍在主旨演讲中描绘道:“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和太平洋与亚非两个大洲之间正生成联结的纽带,为世界的安定与繁荣注入巨大的活力”,<sup>⑨</sup>阐明日本有责任促进“两洋”到“两洲”的交往与合作,呼吁在“法治的支配”下建立起

“印太”地区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充分合作。9月,日本政府在外访印的外交公报中开始使用“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这一表述,<sup>⑩</sup>显示日本明确标定了当前对外战略的核心取向。根据2017年以来多份日本官方文件对于“印太”战略的说明,表面上其核心内容是“使得两洋与两洲联结产生的活力成为国际社会安定与繁荣的关键”,<sup>⑪</sup>其间日本追求的三大目标是“普及并认可法治、航行自由和自由贸易”“追求经济的繁荣”以及“确保和平与安定”。<sup>⑫</sup>实际上,从安倍政府的推进中可看出,日本在“印太”区域的战略规划正表现为“支轴构建”加“周线布局”的并行态势:“支轴”系“民主安全菱形”构想下日美印澳四方组成的核心架构;“周线”则是将“自由与繁荣之弧”构想下的东南亚、大洋洲、南亚、中东到非洲沿线的关键国家依次联结,通过日本主动的战略塑造,以建立一个宏大的战略架构。

在“支轴构建”中,日本高调加入“马拉巴尔”联合军演显示其在印度洋的力量存在,利用“卡卡杜”多国联演的机会促动日美印澳共同搭建实战化环境,<sup>⑬</sup>着重从安全领域切入“菱形”核心架构的缔造,推动其中三个含有日方的三边组合升级为四边战略联动机制。在日方的倡导鼓动下,日美印澳(QUAD)于2017年11月在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举行了局级磋商,围绕地区秩序、航行自由、海洋安全等议题进行讨论。<sup>⑭</sup>进入2018年后,四方会议的举办频次明显增加。当年6月和11月,均在新加坡举行的四方高级别会议开始将核心议题置于对东盟参与地区事务的支持上。<sup>⑮</sup>2019年5月,在曼谷举行的高级别会议上,四方在海洋安全保障与可持续发展领域推升了合作。<sup>⑯</sup>对于“周线布局”,日本侧重实施海外投资与基础设施援建,主推文化与价值观散播,自2016年11月起联手印度实施涵盖东南亚、南亚到非洲大陆的“亚非发展走廊计划”。<sup>⑰</sup>在此基础上,日本适时增进与东盟国家间的军事交流,筹划军备援助和输出,并将防务合作深入到亚丁湾周边的非传统安全领域。由此可见,从起初构思的“菱形”合作机制,到当下四方的实际联动,包括与“印太”沿线国家日益深化的战略联系,日方推动合作的本意最终还

是落于安全领域,不断强调地区秩序、航行自由等因素的重要意义。由此既借力美印又助力各方,促动“印太”布局做实并发挥出其所期待的战略效应。

总体来看,在国际权势动态转移的大背景下,在“普通国家”路线的牵引下,安倍政府正式出台了“印太”战略,表明其试图在更加广阔的地缘范围内更为主动地提升权势与拓展影响,使之成为日本当前对外战略的核心取向。<sup>⑱</sup>在战略缔造中,日本践行的战略具备安全、外交、经济、文化等多重领域的综合属性,但在安倍政府顶层规划中,权势和安全考量愈益重要,尽管其被有意识无意识地包裹在经贸交往、经济援助与价值观散播的外衣下。一句话,安倍政府的权势扩张搭建着日本“印太”战略的多重形态,形成了“支轴构建”与“周线布局”并行推进态势,蕴含着日本在21世纪通过发展海权实现国家伟盛的地缘逻辑和外交新尝试。

### 三、“印太”战略对于日本大战略缔造的含义

国家战略体系的构建诠释着国家以存续和发展为根本目的的一整套运作方式和思维逻辑,处于其中最高层次的国家大战略缔造,旨在从全局观念出发来动员、开发、协调及运用国家各类物质和精神资源,以实现国家根本目标,体现着从国家顶层审视形势与环境的变化、深思目标与手段的关系。<sup>⑲</sup>日本当下国家战略体系包含着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战略重塑,以助力“普通国家化”。而“印太”战略的推行无疑是安倍政府应对国际权势转移与国际格局变化的产物,其战略含义有三:一是对日本“国家自立”目标的赋值功能,二是对日本权势扩张的力量倍增效应,三是对日本核心战略关切的引领作用,因而具有强劲的内在张力。

(一)“印太”战略对于日本“国家自立”目标的赋值功能

如果说战略缔造过程既涉及内部政治影响和个人行为特质,又涉及外部事态和威胁压力,<sup>⑳</sup>那么日本开启的“普通国家”路线进程无疑具备了所有上述特质,成为一个规模宏大且具备长期意义的综合型国家战略愿景。就安倍政府而言,它正大力推进“普通国家”路线两个层面的战略重塑:一是国内层面,

它要求通过修改战后由美国制定的宪法,突破战后体制,重获与其他国家同等的“正常”权利,意在将一个“经贸主导型国家”转变成为能够调集国家所有资源和手段支撑起自身安全与发展的复合型宪政国家;<sup>⑤</sup>二是国际层面,它要求通过实施“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积极塑造外部环境,发展和运用自身的防卫力量,拓展“印太”地区的盟友与伙伴关系,将一个“通商型海洋国家”转变成为能够依靠自身力量保障国家安全、利益、威望和影响的“自立型海洋国家”。以上两个层面的新型国家身份构成了日本“国家自立”的一体两面。当下日本政府在内政外交领域推行的诸多政策举措无疑直指安倍所言“夺回国家自立的目标”。<sup>⑥</sup>

本着这样的战略逻辑,“印太”战略自然成为安倍政府“国家自立”路线在国际层面的核心要义。

首先,“印太”战略体现着日本对国家意志的新探求。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必须具有意志,即必须做出决定。<sup>⑦</sup>同时国家又是理性的体现,<sup>⑧</sup>故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间较量,根本上是理性使然。<sup>⑨</sup>换言之,从国家意志出发看待其对外政策才能挖掘出关乎国家兴衰的终极意义。毋庸置疑,主要大国当前在“印太”地区进行的战略博弈实质就是国家意志的较量与比拼。就日本而言,此刻在经贸立国路线内压抑多年的强权化、自立化诉求正凝结成一股新的地缘战略塑造冲动。其受到右倾保守主义执政力量的鼓动,进而与日本的国家意志相结合,构成了日本国家路线选择的指导思想和新的精神基础。<sup>⑩</sup>与此同时,日本倾注国家意志打造的“印太”战略又深深触及国家间对外政策的交织互动。在同一时空内,其与中美印澳等国的对外战略产生联系并相互影响,以至于日本在国内加紧对“印太”理念进行动员引导,放任国内对中方外交政策的消极解读,提倡与美印澳深化安全合作以构建海洋国家联合阵线。这无非为巩固和强化“普通国家”路线赖以推行的国内基础。

其次,“印太”战略反映着日本对高级政治的新渴求。历史地看,无论是中曾根奠定的“政治大国”理想与“国际国家”目标,还是小泽心目中的“普通国

家”身份,以至安倍规划的“美丽国家”与“崭新国家”愿景,其实都是围绕获取更多国际权势这一主题展开的探索。至于国际影响,不能否认日本曾在很长时期通过经济援助的方式体现作为,但在政治影响力和安全事务上依然缺乏其所期望的国际成就。时至当下,那种仅仅通过低级政治事务带动本国在高级政治领域影响力提升的处事风格,已不能满足日本对新的国际角色的期待。安倍政府践行的“印太”战略,旨在把握国际权势转移中的外部机遇,通过参与高级政治事务进而获取与自身经济实力相符的国际地位和权势。安倍政府的“印太”战略恰恰契合了日本国家路线的这种调适与延展,其宏大的国际视野为日本国家认同的转变提供了崭新机遇:在外交理念推行中为“积极和平主义”找寻现实的载体,在地缘政治博弈中借助海洋国家联合阵线表达对国际安全事务的关切,<sup>⑪</sup>在大国地位追求上以远超亚太的巨型战略区域为依托来实现权势扩张和大国理想。

最后,“印太”战略支撑着日本重振军力的新尝试。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政治现实迫使日本与其他国家一样,时刻关注自身的根本安全与利益拓展,关注自身与对手的力量对比。鉴于“商业才能和金融财富在国际强权政治处于无政府状态的世界上有时是不能满足需求的”<sup>⑫</sup>这一残酷现实,日本现行国家路线中的“自立”目标之一就是要求其具备相当程度的军力水平,特别是要重获海权中的“拒海”能力,使日本符合作为海洋国家联合阵线的“战略盟友”或“战略伙伴”的基本条件。据此,日本将推进“印太”视域下的军力建设与安全合作当作“普通国家”进程的关键环节。一方面借此继续颠覆其战后维系多年的防卫政策原则,渐进动摇着“专守防卫”“不成为军事大国”等防卫政策基础;另一方面借“行使集体自卫权”之名,强化对美作战支援,规划重新武装,通过整合诸多战略资源完善“印太”规划中的“安全菱形”合作机制。这种重振军力的国家思维突显了“印太”战略的军事用意和安全价值。

(二)“印太”战略对于日本权势扩张的力量倍增效应

纵观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国际权势转移进程,

究竟是何种因素推动了“印太”地区战略地位的强势上升,并使之深刻影响着全球地缘政治的大图景?无疑,这主要归因于大国或力量中心的战略动能持续作用于“印太”国际政治的方方面面。<sup>⑤</sup>其中,“印太”战略对于日本积极参与国际权势斗争又有怎样的战略意义呢?

首先,“印太”战略强化了日本地缘身份再建构过程中的“海洋国家”属性,意在着眼更大的战略棋盘进行战略塑造。地缘上,位于“外新月形地带”上的日本,基于安全考量和海洋国家身份认知,表现出一种脱离大陆的战略倾向,故会对“内新月形地带”上的陆海复合型国家产生天然排斥。但由于日本自身安危及利益追求始终与东亚大陆息息相关,这又迫使其不得不时时刻刻关注对岸的种种举动。<sup>⑥</sup>基于这一逻辑,日本通过“印太”战略开启的一系列海上运筹与互动,可认为既是应对来自东亚大陆战略压力的必然反应,亦是一种“依海强国”道路的战略回归。<sup>⑦</sup>审视近年来日本对于增进海权的巨大热忱,可以得出其意在把握国际权势转移中生成的历史机遇,即凭借海洋国家属性进行战略塑造,以此缔造一个有助于日本“普通国家化”同时又能延揽那些地缘身份和价值观念相似国家的海洋秩序。具体就是:在宏观战略架构上依托美国提供的全球公共产品,适时引入印澳合作以获取更大的助力,同时牵引“印太”沿线国家接受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秩序。安倍首相高调抛出“日本要做规则倡导者”,<sup>⑧</sup>就是对该意图的一番印证。

其次,“印太”战略强化了日本战略实施过程中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平衡,意在避免单一路径依赖的困扰。战略缔造的机理之一在于深刻理解国际环境对于制定明智的战略至关重要。<sup>⑨</sup>从2013年出台《国家安保战略》到五年后最新修订的《防卫计划大纲》,日本对于国际环境的研判一再突出了中印等新兴国家崛起对于国际力量格局带来的巨大震动,描绘了国际政治、经济重心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转移。<sup>⑩</sup>基于这层判断,出于对外政策规划中灵活运用手段和力量的战略预期,日本正将“立足于印太地缘视域内的多层次、多角度安保合作”当作发挥自身权势影响

的战略助推因素,用以“保障国家的独立,维护国家的和平与安全”。<sup>⑪</sup>在战略缔造与实施过程中,极为重要的考量是要确保目的与手段间的动态平衡。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南进”时期日本对东南亚、南亚地区的侵占掠夺,其狭隘之处在于当时的日本深陷穷兵黩武的路径依赖之中。而战后几十年的经贸外交表明日本虽习惯于凭借“贸易立国”的身份来施加国际影响或提升威望等级,但国内外战略形势的演变却消磨了这一身份赖以生存的国际环境,从而暴露出日本对外政策实施手段的单一,反衬其在跨地域层级上缺少积极主动的趋势塑造能力。有鉴于此,日本“印太”战略的推行包含着政治、外交、经济、文化和防务在内的多重路径思考,反映了在国际权势转移大背景下,日本政府致力于“使用一切必要的资源用以实现国家政策目标”<sup>⑫</sup>的战略思维。

(三)“印太”战略对于日本核心战略关切的引领作用

像其他国家一样,地缘环境作为基础性因素直接影响了日本的国家战略。其一,岛国环境影响着日本战略关切与资源投入的方向。尽管受到海洋四面环抱的庇护,但日本对外战略思考的首要是如何将资源投入集中于一个方向而非分散化。其二,缺失具有通商价值的门户海峡成为日本发展海权的一大隐忧。<sup>⑬</sup>不具备这一地缘条件的日本,终究要去面对东亚大陆上的巨型体量国家以及由此整合起来的统一大市场。其三,身处“外新月形地带”的日本不得不卷入海陆交锋之中。<sup>⑭</sup>这方面,出于海洋国家的身份认知,日本往往表现出一种“依海制陆”的战略警觉与思维偏执。其四,源于历史的大陆情结深深植入日本战略文化之中。这种情结既有实力不济时的追随行为,又包含着制造大陆碎片状态以发挥离岸平衡效应的企图。以上特质长期影响着日本不同时期的对外政策筹划,并直接映射到当下的“印太”战略之中。同时,安倍政府的“印太”战略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日本的上述战略关切,并赋予其全新的时代含义。

首先,“印太”战略将日本外交政策中对华竞争的意识骤然推升。安倍二度执政后,开始筹划外交

政策的全面转型,核心是在巩固右倾保守主义理念的执政基础上,用“自由开放的印太”理念整合“积极和平主义”与“俯瞰地球仪外交”的精神主旨,以拓展全新的国际空间。其间,日本所谓“基于国际协调的积极和平主义立场”,<sup>⑥</sup>遵循的其实是与美国开展全方位合作、扩大发挥自身作用空间的逻辑,依此引领对外政策的蜕变。结果便是与美国实现战略并轨,将关切投向“印太”,进而经略“印太”。碍于自身权势不足以单独控制“印太”沿线,受制于自身控制门户海峡能力的薄弱,担忧相关国家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而过分靠近中国,日本由此催生出强烈的警觉与排他意识。鉴于日本当前实施开发援助的重点地区与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优先地区重合度甚高,即便2017年以来日本对华合作转趋积极,但在增强合作动能的同时,日本并未降低危机感与竞争意识。经济利益服从安全考量的思维定式,使安倍政府更为注重与美印澳开展安全合作,导致日本的对华政策始终无法摆脱地缘政治的影响。

其次,“印太”战略使得日本防卫政策中攻防转换的速率明显加快。当前,日本将自身安全威胁的紧迫性与地缘环境的严酷性置于战略思考的中心位置,由此体现出强化防卫力量的政策趋势。在“印太”地缘战略视域下,日本面向未来构建的“多次元统合防卫力量”,<sup>⑦</sup>意在契合新兴战略领域作战理念的生成,结果进一步推动了防卫政策趋于进攻取向的转型。一方面,日本致力于构建“面向宇宙、网络及电磁空间与传统领域融合环境下的作战力量”,<sup>⑧</sup>达成其“跨领域作战”概念中对于更大地缘维度的监控与争夺。同时,日本愈加重视东亚大陆上的“核导威胁”,寻求拥有对等打击能力的中程机载巡航导弹,<sup>⑨</sup>以获取防区外打击敌方导弹发射源头的的能力。据此,日本改装“出云”级直升机护卫舰,为其搭载F-35B战斗机,今后还能够与驱逐舰、潜艇组成航母打击群实施远海机动和海空联合作战,达成所谓“反制攻击”的效果。防卫省更是直言要让担负导弹防御之责的“宙斯盾”型舰只“回归本应践行的海上安保任务中去”。<sup>⑩</sup>据此,2019年9月下旬,拥有海基“宙斯盾”战斗系统的“鸟海”驱逐舰开始参与“马拉巴

尔”年度联演中的海上机动、对抗、射击和反潜科目,展示战斗能力。<sup>⑪</sup>这表明日本在“印太”区域内开启的作战样式正剥离“专守防卫”的政策限定,更是超越了亚丁湾护航和波斯湾扫雷等以往行动,使争夺“印太”海上主导权为目的的行动成为今后的常态。

最后,“印太”战略将日本同盟政策中依海制陆的偏执持续固化。在当前愈益重视发展海权的目标指向下,日本将“印太”地区视作极其重要的战略区域。鉴于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的加速,日本谋求整合“印太”地区海洋国家,以联合阵线展开应对。关于日本长期深耕的“民主安全菱形”架构,安倍直白地将其看作全球性海洋国家与“亚洲最大海洋民主国家”的天然融合,<sup>⑫</sup>对强化同盟与合作关系给予厚望。当下,日美同盟海上行动的范围正由亚太延伸至“印太”,既突出所谓“全球性质”,<sup>⑬</sup>亦彰显“依海制陆”的地缘思维偏执。当前,日本连年交替派出“出云”和“加贺”这两艘吨位最大的“母舰”及护航舰只,配合美军航母打击群在南海进行联演,<sup>⑭</sup>其实质不单是维护所谓“海上航行自由”,更多是海上联合实战的试探和预演。在日美印澳“安全菱形”的联动趋势中,日本还极力增进与印澳两国的战略对接,有意助推印度在安达曼—尼科巴群岛升级军事基地,<sup>⑮</sup>进而卡扼印度洋东侧通向南海的咽喉要道,渐进诱导二者介入南海形成联合遏华之势。这种以强化同盟合作为主轴,对接印澳找寻战略聚合的政策导向,看似在勾勒一个宏大的联盟与伙伴关系网络,实质依旧未脱离海陆二元对抗的思维桎梏。

#### 四、结论

在日美等国的引领下,以“印太”为基本战略取向的地缘大整合已然开启,直接影响着大国关系走向。其中,身为海洋国家的日本,在安倍的强势领导下,坚守历史造就的大国志向,历经十余年的时机酝酿,终将调适成型的“印太”战略深深嵌入当下的国家战略体系。如今,日本的“普通国家”路线与“印太”战略交织联动,并与中国的对外政策和海洋方向的经略交汇互动。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为达成其所谓“国家自立”目标,安倍政府在构思和推行“印太”战略的过程中,始终秉持国际权势斗争逻辑:一是打

着“普通国家”旗号,为日本新一轮国际权势扩张夯实基础;二是将中国视为主要对手,努力使本国战略谋划与美国对华战略并轨;三是主动构建所谓海洋国家联合阵线,以借力应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正是由于安倍政府“印太”战略鲜明的中国指向性,特别是其地缘对抗思维和战略竞争逻辑,一度致使中日关系中的战略风险明显上升。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印太”战略构想与政策实践不仅存在战略认知上的局限和扩张权势的内在冲动,还有地缘政治的诱惑和国际权势转移的强制作用。为维护中日关系总体稳定和渐趋向好势头,我们应当透过历史和地缘双重维度,研习日本“印太”战略思想演化轨迹,理解其战略逻辑构思,审视其战略缔造动能与政策进度,明辨其对华实有和潜在影响,据此思考中国的应对之策。

#### 注释:

①森岡邦泰:『日本の開業思想—本多利明を中心に』、日本:『大阪商業大学論集』、第10巻第3号(通号175号)、2015年1月発行、第44—45頁。

②浦野起央:『日本の国境:分析・資料・文献』、日本:三和書籍2013年版、第30頁。

③大畑篤四郎:『大陸政策論の史的考察』、日本:国際法外交雑誌、第68巻第4号、1969年。

④大辞林(3.0):『雄飛』、日本:三省堂2015年1月発行。

⑤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1巻)』、日本:岩波書店1940年版、第350—351頁。

⑥宋德星、殷实:《地缘属性、文化特质与日本的大战略缔造:一项侧重于地理与文化维度的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8期,第60頁。

⑦儿岛襄著,彤彤译:《太平洋战争》,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版,第50—51頁。

⑧Samuel Eliot Morison,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Volume 3, The Rising Sun in the Pacific*,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54, pp.381—382.

⑨儿岛襄:《太平洋战争》,第148頁。

⑩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海军在印度洋展开军事行动的论述,参见宋德星:《印度海洋战略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2016年版,第33頁。

⑪儿岛襄:《太平洋战争》,第329頁。

⑫克莱顿·詹姆斯:《太平洋战争中美国和日本战略》,载

彼得·帕雷特主编,时殷弘等译:《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713頁。

⑬Takashi Inoguchi, "Peace-Making and Party Politics: The Formation of the Domestic Foreign-Policy System in Postwar Japan,"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Vol.11, No.2, 1985, pp.323—324.

⑭吉田茂著,张文、张凡译:《激荡的百年史——我们的果断措施和奇迹般的转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130—134頁。

⑮高坂正堯:『海洋国家日本の構想』、日本:中央公論新社2008年版、第185頁。

⑯高坂正堯:『海洋国家日本の構想』、日本:中央公論新社2008年版、第243頁。

⑰赫德利·布勒著,张小明译:《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70頁。

⑱法学館憲法研究所:『中曾根内閣の成立と「戦後政治の総決算」』、日本:2009年, <http://www.jicl.jp/now/jiji/backnumber/1982.html>, 访问时间:2019年6月25日。

⑲自民党海空技術調査会:『海洋国家日本の防衛』、日本:原書房1972年版、第26—73頁。相关研究参见段廷志等:《佐藤铁太郎》,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⑳高兰:《日本海洋战略的发展及其国际影响》,载《外交评论》,2012年第6期,第56頁。

㉑福田毅:『日米防衛協力における3つの転機—1978年ガイドラインから「日米同盟の変革」までの道程』、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調査及び立法考査局『レファレンス』平成18年7月号、2006年、第153頁。

㉒データベース「世界と日本」:『鈴木善幸総理大臣とロナルド・レーガン米大統領との共同声明(1981年5月8日)』、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http://worldjpn.grips.ac.jp/documents/.texts/JCUS/19810508.D1J.html>, 访问时间:2019年5月28日。

㉓福田毅:『日米防衛協力における3つの転機—1978年ガイドラインから「日米同盟の変革」までの道程』、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調査及び立法考査局『レファレンス』、平成18年7月号、2006年、第154頁。

㉔宋德星:《国际政治中的战略大图景》,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32頁。

㉕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参见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31—34頁。

㉖宋德星:《21世纪全球地缘政治大图景与大国地缘战略关切:简论中国的基本方略》,载《国际展望》,2015年第2期,第12頁。

㉗安倍晋三:『新しい国へ、美しい国へ(完全版)』、日本:

文艺春秋2013年版、第163頁。

②⑦安倍晋三:『新しい国へ、美しい国へ(完全版)』、第164頁。

②⑧安倍晋三:『第165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13本:首相官邸、2006年9月29日, <http://www.kantei.go.jp/jp/abespeech/2006/09/29syosin.html>, 访问时间:2019年7月11日。

②⑨麻生太郎:『「自由と繁栄の弧」をつくみ—拡がみ日本外交の地平』、日本:外務省、2006年11月30日, [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enzetsu/18/easo\\_1130.html](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enzetsu/18/easo_1130.html), 访问时间:2019年7月11日。

③⑩宋德星:《国家意志与大国东亚地缘战略大角逐》,载《外交评论》,2014年第6期,第7頁。

③⑪安倍晋三:『新しい国へ、美しい国へ(完全版)』、第7-8頁。

③⑫安倍晋三:『第百八十三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日本:首相官邸、2013年1月28日, [https://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20130128syosin.html](https://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20130128syosin.html), 访问时间:2019年6月30日。

③⑬Shinzo Abe, "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strategic-alliance-for-japan-and-india-by-shinzo-abe>, 访问时间:2019年7月4日。

③⑭Shinzo Abe, "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strategic-alliance-for-japan-and-india-by-shinzo-abe>, 访问时间:2019年7月4日。

③⑮安倍晋三:『日本は戻ってきました』、日本:首相官邸、2013年2月22日, [https://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013/0223speech.html](https://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013/0223speech.html), 访问时间:2019年7月4日。

③⑯外務省:『日印ヴィジョン2025:特別戦略的グローバル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インド太平洋地域と世界の平和と繁栄のための協働』、日本:2015年12月12日, [https://www.mofa.go.jp/mofaj/s\\_sa/sw/in/page3\\_001508.html](https://www.mofa.go.jp/mofaj/s_sa/sw/in/page3_001508.html), 访问时间:2019年6月28日。

③⑰宋德星:《新时代·新动能·新趋势——从2017年世界形势看国际战略演进大趋势》,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8年第1期,第21頁。

③⑱安倍晋三:『TICAD VI(第6回アフリカ開発会議)開会セッション安倍総理基調演説』、日本:首相官邸、2016年8月27日, [https://www.kantei.go.jp/jp/97\\_abe/statement/2016/0827opening.html](https://www.kantei.go.jp/jp/97_abe/statement/2016/0827opening.html), 访问时间:2019年7月6日。

④⑰外務省:『日印首脳会談』、日本:2016年9月7日, [https://www.mofa.go.jp/mofaj/s\\_sa/sw/in/page3\\_001805.html](https://www.mofa.go.jp/mofaj/s_sa/sw/in/page3_001805.html), 访问时间:2019年7月4日。

④⑱外務省:『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に向けて』、日本:2019年1月、第2頁, <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407642.pdf>, 访问时间:2019年7月4日。

④⑲外務省:『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に向けて』、日

本:2019年1月、第2頁, <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407642.pdf>, 访问时间:2019年7月4日。

④⑳下平拓哉:『インデ太平洋地域の海洋安全保障と海協力の方向性—QUADとASEANの連携』、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ブリーフィング・メモ』、2018年6月号、第5頁。

④㉑外務省:『日米豪印のインド太平洋に関する協議』、日本:2017年11月12日, [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press4\\_005249.html](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press4_005249.html), 访问时间:2019年7月11日。

④㉒外務省:『日米豪印協議』、日本:2018年11月15日, [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press1\\_000293.html](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press1_000293.html), 访问时间:2019年7月11日。

④㉓外務省:『日米豪印協議』、日本:2019年5月31日, [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press4\\_007482.html](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press4_007482.html), 访问时间:2019年7月11日。

④㉔外務省:『日印首脳会談』、日本:2017年11月17日, [https://www.mofa.go.jp/mofaj/s\\_sa/sw/in/page3\\_001879.htm](https://www.mofa.go.jp/mofaj/s_sa/sw/in/page3_001879.htm), 访问时间:2019年7月5日。

④㉕外務省:『平成29年度開発協力重点方針』、日本:2017年、第9頁, <https://www.mofa.go.jp/files/000245509.pdf>, 访问时间:2019年7月6日。

④㉖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参见张春、时殷弘:《大战略:理论与实例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7期,第71-75頁。

④㉗威廉森·默里、马克·格利姆斯利:《导言:论战略》,载威廉森·默里等编,时殷弘等译:《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頁。

④㉘20世纪80年代中曾根康弘执政时期所规划国家路线的核心思路是:正视自卫权“限制在必要最小限度”的“暧昧”表述,从宪政层面明确自卫权的行使限度,推进修宪进度并制定《国家安全保障基本法》。参见中曾根康弘著,联慧译:《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56、62、133頁。中曾根奠定的路线在日本保守政治势力中博得了广泛长久的认同,并在当下由安倍晋三等持续贯彻、推升和拓展。

④㉙安倍晋三:『新しい国へ、美しい国へ(完全版)』、第33頁。

④㉚查尔斯·泰勒著,张国清、朱进东译:《黑格尔》,南京:译林出版社1975年版,第676頁。

④㉛乔治·萨拜因著,邓正来译:《政治学说史(下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9頁。

④㉜宋德星:《国家意志与大国东亚地缘战略大角逐》,载《外交评论》,2014年第6期,第5頁。

④㉝刘强:《论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调整——基于日本战略文化和战略意愿的视角》,载《国际观察》,2009年第5期,第47頁。

④㉞防衛省:『日米防衛協力のための指針』、日本:2015年、第13-14頁, <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78187.pdf>, 访问时间:2019年7月17日。

⑤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革与军事冲突》,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212页。

⑥宋德星:《新时代·新动能·新趋势——从2017年世界形势看国际战略演进大趋势》,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8年第1期,第2页。

⑦宋德星、殷实:《地缘属性、文化特质与日本的大战略缔造:一项侧重于地理与文化维度的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8期,第58页。

⑧日本保有鲜明的海洋国家属性,这在日本战后首部《国家安保战略》中得到明确阐释。参见国家安全保障会议、閣議:『国家安全保障戦略』、日本:2013年、第2頁, [https://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pdf/security\\_strategy.pdf](https://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pdf/security_strategy.pdf), 访问时间:2019年7月6日。

⑨安倍晋三:『日本は戻ってきました』、日本:首相官邸、2013年2月22日, [https://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013/0223speech.html](https://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013/0223speech.html), 访问时间:2019年6月28日。

⑩威廉森·默里、马克·格利姆斯利:《导言:论战略》,第6页。

⑪国家安全保障会议、閣議:『国家安全保障戦略』、日本:2013年、第5頁, [https://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pdf/security\\_strategy.pdf](https://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pdf/security_strategy.pdf), 访问时间:2019年7月6日;国家安全保障会议、閣議:『平成31年度以降に係る防衛計画の大綱』、日本:2018年、第2頁, <https://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2019/pdf/20181218.pdf>, 访问时间:2019年7月6日。

⑫国家安全保障会议、閣議:『平成31年度以降に係る防衛計画の大綱』、日本:2018年、第1-2頁, <https://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2019/pdf/20181218.pdf>, 访问时间:2019年7月6日。

⑬克莱顿·詹姆斯:《太平洋战争中美国和日本战略》,第685页。

⑭“海权之父”马汉阐明了呈碎片状态的欧洲国家在贸易互通中严重受制于英吉利海峡,突出了这类门户海峡的战略价值。参见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著,李少彦等译:《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北京:海洋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页。但对日本而言,宫古海峡和对马海峡缺少足够的通商价值,一时侵占到手的台湾海峡却游离于本土核心四岛,对岸大陆上则存在一个形成统一市场的巨型体量国家。

⑮在地缘政治理论家麦金德勾勒的国家间博弈景象中,海权与陆权的交锋往往成为推动国际权势等级结构变迁的底层逻辑。参见哈尔福德·麦金德著,王鼎杰译:《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3页。

⑯外務省:『平成30年版外交青書』、日本:2018年、第6頁, <https://www.mofa.so.jp/mofaj/gaikao/bluebook/2018/pdf/pdfs/1.pdf#page=4>, 访问时间:2019年7月22日。

⑰国家安全保障会议、閣議:『平成31年度以降に係る防衛計画の大綱』、日本:2018年、第9-10頁, <https://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2019/pdf/20181218.pdf>, 访问时间:2019年7月9日。

⑱国家安全保障会议、閣議:『中期防衛力整備計画(令和元年度一令和5年度)』、日本:2018年、第1-6頁, [https://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2019/pdf/chuki\\_seibi31-35.pdf](https://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2019/pdf/chuki_seibi31-35.pdf), 访问时间:2019年7月9日。

⑲防衛省:『我が国の防衛と予算—令和2年度概算要求の概要』、日本:2019年、第15頁, <https://www.mod.go.jp/j/yosan/2020/gaisan.pdf>, 访问时间:2019年7月9日。

⑳防衛省:『令和元年版防衛白書』、日本:2019年、第284頁, [https://www.mod.go.jp/publication/wp/wp2019/pdf/R01\\_Boei\\_PDF.zip](https://www.mod.go.jp/publication/wp/wp2019/pdf/R01_Boei_PDF.zip), 访问时间:2019年10月14日。

㉑海上自衛隊海上幕僚監部:『日米印共同訓練(マラバル2019)』、日本:2019年9月25日, <https://www.mod.go.jp/ms-df/release/201909/20190925.pdf>, 访问时间:2019年9月25日。

㉒安倍晋三:『第百八十三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日本:首相官邸、2013年1月28日, [https://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0130128syosin.html](https://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0130128syosin.html), 访问时间:2019年6月29日。

㉓防衛省:『日米防衛協力のための指針』、日本:2015年、第13-14頁, <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78187.pdf>, 访问时间:2019年7月17日。

㉔産経新聞:『海自護衛艦「いずも」「さざなみ」が米空母「R・レーガン」と共同訓練中国を牽制』、2017年6月16日, <http://www.sankei.com/politics/news/170616/pl1706160036-n1.html>, 访问时间:2019年7月9日。

㉕长尾賢:『軍事化するインドと中国のパワーゲーム—日本にとっての意味—』、日本:笹川平和財団、2018年, <https://www.spf.org/iina/articles/nagao-india-powergame.html>, 访问时间:2019年7月9日。